

难忘的岁月

——献给义县解放43周年

胡博仁

到公元1991年10月1日，义县解放整整43周年了。义县这块土地沐浴着新时代的阳光雨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乡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生活蒸蒸日上，可谓今非昔比，换了人间。

我已年届六旬。人越是到老年，越爱追忆逝去的岁月。解放前，我那悲惨的童年，心酸的往事；解放义县时的艰苦奋斗，令人难忘。历史是面镜子。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认识现实，把握未来。在今天，无论“过来人”还是“后来人”，都不应该忘记过去，不能方饮甘泉水忘了挖井人。经常想想过去，把新旧社会加以对比，就较容易看出两种制度谁优谁

劣；追怀当年革命的艰苦历程，就会倍感社会主义江山来之不易，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激励起奋发向上的革命精神。

出于这样的思考，今将我苦难的童年和当年参加义县解放斗争的一些亲身经历回忆出来，纪念义县解放43周年，也献给家乡人民，特别是那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后来人。

一、人间地狱，悲惨童年

1930年8月，我出生在义县石佛堡村，家境一贫如洗，靠父亲一个人挑担卖瓦盆和集日“打斗”来养家糊口，真是度日如年。我五岁那年，两岁的弟弟因营养不良，病饿而死。当时我还小，不太懂事，但我仍清楚地记得，母亲怀抱死去的弟弟，嚎啕大哭，几乎背过气去。这对我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强烈的刺激。看着父母哭，我也跟着哭。我不解地问：“小弟咋死了？我不能和小弟玩了？”这一问不要紧，父母哭得更厉害了。

1937年秋，我刚刚八岁，大祸突然降临我家。年仅42岁的父亲积劳成疾，没钱买药医治而死去。接连的不幸，对母亲的精神打击太大了。她整天哭泣，乡亲谁劝也不行，最后因悲伤过度，得了精神分裂症。妈妈守着父亲的遗体又哭又喊：“你走了，我们娘俩可咋活呀！”“老天爷呀，你咋不可怜可憐我呀！”在场的人无不心酸落泪。

父亲病故之时，家里只剩下一升米，两捆秫秸。在乡亲们的帮助下钉了一个薄板白茬棺材，把父亲埋在了东山。以后，母亲带着幼小的我，只好走村串户要饭维持生活。有一次，母亲身体发烧，不能带我出去了。我出去要了一天，晚上空着手回来。母亲怕我饿坏，强撑着到西院把人家的米汤要来，稀的自己喝，剩点“饭根”给我吃。秋收开始后，母子俩到地里拣豆枝，有时遇到给地主拉秋的大车，母亲就跪下哀求人家：“大爷大哥，可怜可怜我们吧！我们快要饿死了，给两穗子帮帮我们

吧！”我也学妈妈的样，跪在地上边哭边说：

“爸爸死了，我家没吃的了，大爷大叔行行好吧！”扛活的穷哥们看着我们实在可怜，就偷着扔下点高粱穗。就这样，白天到大地里去拣、去要，晚间母亲用手搓，脱米粒，再用棒子在小碾缸里捣，如此碾米，把她累得腰酸腿疼，精疲力尽。

冬天来了，北风怒吼，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我们孤儿寡母生活无以为计。万般无奈，母亲只好拉着我到王民屯外祖父家。我的外祖父也是贫农。二老年逾古稀，双目失明，舅舅由石山站往回背盐，表兄卖力工，全家六口只能勉强糊口。我们母子一去，增加了两张嘴，短时间还可维持，时间长了就承受不了。我们在外祖父家糊弄了一冬后，外祖父家吃的也眼见着有上顿没下顿。

春节刚过，有人给母亲介绍了一家人家，劝母亲改嫁。因为我是男孩，对方不准带去。这下子可难坏了母亲。儿是母亲心头肉，哪个

母亲不疼儿。开始，母亲说什么也不肯。可是不走又怎么办呢？她自己带着我过，没有独立生活能力，早晚也是没活路。留在外祖父家，两张嘴拖累得全家多受苦，长时间也不是办法。后经大家反复劝说，母亲咬着牙同意改嫁了。那天晚上，母亲看着熟睡的我，亲了又亲，泪如泉涌：“孩子，不是妈心狠，是妈没法子呀！”就这样，母亲一步三回头，哭着偷偷地离开了我。

母亲刚走那几天，我不知道妈妈上哪去了，就天天哭闹着找妈妈。外祖母他们都谎说妈妈串门去了，过些日子就回来。岂知，我盼了一天又一天，等了一月又一月，也没有把妈妈盼回来。后来我才知道，母亲走后不放心我，曾两次回来看我，但又怕母子见面后我不让她走，只好偷偷地看，看一次哭一次。这种亲生骨肉生离死别的打击，使本来就有精神分裂症的母亲怎能承受得了呢？每次她看我，就一连几天精神不正常，后来人家就干脆不让母

亲回来了。时间长了找不到母亲，我也就不再哭闹了。但是，想念母亲的感情却从来没有磨灭，时常在睡梦里母子相见，哭着惊醒。

过去有句老话，叫作“穷在街头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说的是旧社会的世态炎凉，人情如纸。现在想起来，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完全是那种黑暗的社会造成的。拿我来说，几家亲友一家比一家穷，连自己的老小都顾不过来，我在谁家时间长了都不行，因此只得在几个亲友家“串房檐”，这家几天，那家几日，实际是不流浪的流浪。只有一户好亲戚，父亲的娘舅我的舅爷家很富有（地主），我去了几次非但没吃来饭，反被他家养的几条大狗给咬了出来。

到了1940年初，10岁的我懂点事了，不愿过寄人篱下的生活，万般无奈，就自己跟着一个老头儿入了“义县玉龙山博济慈善会”附设的孤儿院。先去的孤儿按“博”字起名，后去的孤儿按“济”字起名。我是第一批去的，

所以给我起名叫胡博仁，沿用至今。我父亲哥俩，二叔二婶先后病故，扔下堂弟年仅六岁，在家乡一带乞讨为生，小名叫铁秃子，经我推荐孤儿院把他也收容了去，起名叫胡博义。

博济慈善会以孤儿院为招牌，吸引一些善良的人们给予施舍，也是为了做欺骗宣传，证明伪满洲国如何如何好。其实，这里的孤儿根本没有幸福可言，简直是非人的生活。拿吃的说，主食一日三餐喝稀粥，还不让吃饱；副食，夏秋季是青菜沾盐水，有时加点香油渣子算是改善生活了，冬春季几乎餐餐煮干白菜叶子沾盐水。穿的是，冬天三年一套棉衣，没有内衣，从早春到深秋只一套单衣，夏季都是光着膀子穿条小裤衩。春夏秋三季脚上都是木头板鞋，孩子们感到行走不方便，干脆光着脚跑，时间长了脚掌磨得老厚，扎一下都不知道疼。冬天棉鞋破了没人补，脚丫都露在外边，许多孩子的脚被冻伤。衣服由于长期不能换

洗，里面长满了虱子，夏天还好，冬天简直没办法，虱子钻进破棉絮里，怎么也抓不出来。孩子们被虱子咬得难忍，有时气得掏出一块棉絮用石头砸，虱子血竟把棉絮染红了。住的条件也很差，土炕上一领破席子，没有褥子，只有一条很薄的棉被。数九寒冬也很少烧火，炕又冷又潮，冻得大家都缩成一团儿。一些孤儿由于长期遭凉受潮，患了夜尿症。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夜间尿了炕怕挨打，就用身体把被焙干，干不了的，次日早早起来，把尿湿的地方叠在里面卷起来，不让先生看见，到了晚上还是潮乎乎的。

我住孤儿院的第三年，孤儿们全部患了疥疮。“疥是一条龙，先打手上行，腰上盘三圈，屁股扎老营”。疥疮先痒后疼，挠破了流脓淌血，最后坐不了炕，孩子们都跪着哭。院方一看不好，弄来一些草药，把孤儿们扒光衣服，往周身上擦，站成一个大圈，中间放一堆谷草，用火点燃，前后熏烤，烤得孩子们哇哇

直叫，谁也不能动窝。谁要忍受不了，身体挪动一下，先生就用教鞭抽屁股，那滋味真是无法形容。有的孤儿受不了孤儿院的罪，就偷偷地逃跑，但都被院方抓了回来，抓回来就毒打。有一年龄较大的孩子多次逃跑，抓回来后一次比一次打得狠，最后竟活活地给折磨死了。

回想我的童年，心灵上打下了痛苦的印记。至今，我身上仍留着旧社会留给我的伤疤。头顶上一道一寸多长的疤，是跟着母亲要饭时被人家狗咬的。当时头盖骨都被咬豁开一条沟，血流如注。母亲没有药，就用高粱米面子糊，没想到还慢慢好了。额头上的疤，是被地主家的孩子用炉钩子给刨的，现在仍能看到陷进去的坑印。我在孤儿院得了夜尿症，直到参加革命后的最初几年，还时常犯。脚上的冻伤至今仍年年冬天找我的麻烦，稍不注意防寒，就痒痒钻心。每想起这些，我就发自内心地感到，旧社会是人间地狱，新中国是幸福天

堂。

二、逃离苦海，投身革命

1947年冬，我刚17岁，听说北边来了八路军，帮着穷人搞土改，分田地，实行“耕者有其田”。我想，象我这样的穷光棍，只能给地主放羊，扛小活，扛大活，没有其他出路。所迫无奈，就产生了投奔八路军的想法。那时穷人参加革命，大都是我这种情况，是逼上梁山，图的是找碗饭吃。人们要再有别的出路，一般是不冒着生命危险去当兵的。正是这些穷人在革命队伍中受到教育后，提高了觉悟，革命最坚决，作战最勇敢。

1948年，春节刚过，我单身一人去找八路军。结果，没有找到八路军，却参加了热辽21分区地委土改工作团，就这样参加了革命队伍。

入伍后，我被分到侯宪章同志负责的工作组。组里还有小殷、老殷、老丁，共五六个人。他们都比我年龄大，从工作到生活，就象

亲哥哥一样关心我，帮助我。我第一次成了享有平等地位的人，并第一次领悟到同志间的阶级感情。

我参加革命那时候武器非常缺乏，开始只给我发一颗手榴弹。我就用一条小麻绳绑在木把上，结个套，拴在腰带上，一跑起来直打屁股，但还感到挺神气。后来发给我一支“三八”大盖枪，五发子弹。由于当时我年龄小，个子矮，枪背在肩上，枪嘴向下，走路稍不注意就碰脚后根。

1948年5月，侯宪章、老丁和我分配到北阜义联合县第11区，区指导员（即区委书记）是张志峰，区长祁文。开始行李不够用，张指导员就让我同他睡在一个被窝里。义县解放后，张指导员调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我有时进城开会晚上去看他，还是睡在他的被窝里。在那艰苦奋斗的年代，同志间不分职位高低，不分资历长短，一律是平等的阶级兄弟，互相爱护，亲如手足，这纯洁的革命友谊，至今记忆

犹新。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情义深”，这确实是对当年军民干群关系的一句真实写照。那时我们区里的干部、战士，保卫革命胜利成果不怕牺牲流血，群众也象对待亲人一样地保护干部战士。大约在六月下旬，我患了重感冒发高烧，头晕脑胀，坐都坐不起来，躺在石头庙子村一位堡垒户孟老大爷家。当地无医无药，只好硬挺。孟大爷在外屋焦急地烧开水，老大娘一会儿往我嘴喂点加了盐的凉开水，一会儿用冷毛巾放在我头上冷敷。他家吃高粱破子，却想办法做小米粥、鸡蛋糕等好吃的给我。

一天夜间11点多钟，村里的狗咬得很厉害，这是有敌情的信号。随之来两名我们小组的区干部找我，他们焦急地说：“有情况，你注意隐蔽好，我们俩先转移。”孟大娘接着也劝说：“小胡，你病成这个样子可不能走啊，我赶快给你换衣裳，敌人进来我就说你是我儿子。”我想：过去受凌辱，现在做主人，我恨

透了反动派，有点病怎能藏起来呢！况且，一旦暴露身份，势必连累爱护我的老乡。于是我坚定地说：“不行，就是死我也要 and 同志们战斗在一起，爬也要爬出去。”他俩看我态度这样坚决，就把我扶起来，架着我的两个胳膊从后门走出去。后院墙外有敌人，我们就到后院角门边停下来，甩出一颗手榴弹，顶着爆炸的硝烟冲进了高粱地。而后，我们又运动到村子西头路边放了几阵排子枪，扔了几颗手榴弹，随后北村五台也给予鸣枪支援，敌人没来得及骚扰破坏就吓得逃去了。

三、斗智斗勇，保卫人民政权

1948年夏初，我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国民党军队则由进攻转入防御和困守。然而敌人野心不死，一些国民党杂牌军热北队、清剿队和地主武装还乡团、红眼队、大耳朵队以及土匪等，不时窜入我解放区，疯狂地进行骚扰和阶级报复：抓“区牙子”，伤害干部，抢掠牲畜、粮食、大布，妄图摧垮新生的

人民政权。在共产党领导下，解放区的广大干部和翻身农民，机智勇敢地同敌人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

从当时我地方武装局部情况看，尚属敌强我弱。我所在的北平义联县第11区，只有两名领导，区委书记和区长，包括看家的秘书在内，总共只有十四五名干部。另有一个区小队，只有20多人。武器也比较破旧，弹药缺乏。区干部除区委书记、区长等几名老同志使用匣子枪外，多数都是杂八凑的枪枝，诸如套筒子、日本三八大盖、马金钩、马三八和狗牌、蛇牌等杂牌子，每支大枪只有二三十发子弹，每支小枪不过五七发子弹。区小队战士使用的武器，基本有两种，一种是套筒子，一种是三八大盖，后者算是最好的武器了。子弹也不多，每支枪不过三四十发，加上一些土造手榴弹。

对比之下，那些国民党杂牌军、土匪和地主武装使用的武器都是美式七九步枪、冲锋

枪、匣子枪和瓜皮手榴弹，比我们精良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我地方武装如何保卫解放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最根本的是靠我们干部战士的无产阶级觉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以及同老百姓的血肉联系，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在打击敌人的战术上则是，能打就打，打不了就赶跑，相机杀伤之。当时我区分东西两线部署力量，以西线沿细河各村为重点，区小队布防在西线，半数的区干部活动在西线，区委书记也把主要精力放在西线。针对敌人经常在夜间骚扰解放区的情况，区小队每天夜里游动埋伏在河东岸灵活机动打伏击；区干部白天工作，挤时间睡点觉，夜间分散活动在沿河村屯，机动防守。

虽然敌强我弱，有时寡不抵众，但由于我地方武装发扬了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依靠广大群众，同敌人斗智斗勇，依然保卫了解放区，保卫了群众，保卫了人民政权。

石头庙子摆战场。农历五月十四五日的

夜里，侯宪章同志率领吴桐、丁树元和我等五六名同志防守在六台村。这天晚上，区小队设防在村西细河东岸树林中。大约在深夜11点钟，位于六台以北五华里的石头庙子村的两名群众跑来送信。他们一进门就气喘吁吁地说：“同志，不好了，红眼队进了我们村，有好几十人，各处设卡，正在打人、抢东西，我们好不容易才跑出来。”

接到老乡报信，我们立即同区小队刘海宽队长研究了作战方案：区小队由西向北快速前进，埋伏在石头庙子村西、红眼队逃回的必经之路打伏击；区干部战斗小组，由六台东山北进，下山后由石头庙子村东进行奇袭，轰跑敌人。这一头轰，一头打，就能重创敌人。我们区干部战斗小组进到距离石头庙子约有二华里的时候，只听西边枪声大作，石头庙子上空升起几颗信号弹。这突然情况的出现，使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大伙一合计，还是按原计划行动。我们几个区干部飞步下山，运动到村

东南小河边观察敌情，做好攻击准备。然而，此时夜深人静，不见敌人行踪。于是我们又匍匐前进，过河后即进入村东一个南北小胡同，贴着墙向北摸，直到该村一条东西长街停住。这时，仍不见敌人目标。这下子，同志们可有点沉不住气了，打仗就怕情况不明，而且我们在明处，最容易遭伏击。怎么办？还是侯宪章同志有经验，他分析：“敌人可能埋伏起来了，没有目标就不好打。我们猛冲一下，把敌人引出来再说。”于是他带领大家贴着南墙由东向西冲，边鸣枪，边喊杀。当冲到村中间时，有几个老乡出来了，告诉我们说：“红眼队已经跑了。这些坏蛋，听到西边枪声激烈，就急忙把抢的粮食、大布装上车，象兔子一样逃了。”

原来，区小队由南往北行进中，发现前面有人，就问“哪一个，干什么的？”对方不但不回话，反而撒腿就跑。结果区小队把逃出的群众误认为敌人而打了排子枪。红眼队不知虚